



东方文学丛书

〔新加坡〕凯瑟琳·林 著

张国培 译 马宁 校

变心



45

变 心

〔新加坡〕凯瑟琳·林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方山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1.25字数：24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

ISBN7—5378—0460—5

I·438 定价：6.00元

**谨以此书的出版，纪念中国、
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

目 录

把握新加坡时代脉搏的女作家凯瑟琳·林(前言)···	(1)
毒蛇的牙齿·····	(12)
变心·····	(179)
穆尼安迪·····	(208)
婚礼·····	(233)
卡伦·····	(240)
三姑奶奶的故事·····	(274)
结婚纪念日·····	(294)
英语教师的秘密·····	(311)
瓦尼莎·陈白莉·····	(329)
阳台上的老人·····	(352)

把握新加坡时代脉搏的 女作家凯瑟琳·林 (前言)

凯瑟琳·林是当代新加坡用英文写作的著名中年华裔女作家。

她于一九七八年出版了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小讽刺：新加坡故事》，一举成名，从此崭露头角。该书成为畅销书，先后重版过四次。一九八〇年又出版了《不然的话，闪电之神及其他故事》（或译《否则，天打雷劈及其他故事》）短篇小说集，该书于一九八一年又再版。除此，一九八二年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毒蛇的牙齿》。一九八三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他们回来了》。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梦的影子》——新加坡爱情小说集。

她的中短篇小说多取材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华族在新加坡二百五十多万人口中占百分之七十六左右，约一百九十二万多人。在亚洲地区，居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是一个丰富的材料宝藏。非常可喜和难得的是，作者热衷于发掘这一丰富的宝藏。这固然与她是华人的后裔有一定关系，较长时间了解和熟悉华人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她“对于新加坡的社会形态与人民有一种探索的狂热。她喜爱和人交谈接触，

以了解更多的事物，她对华人的传统与风俗习惯极感兴趣……”^①

她的中短篇小说取材，多来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人包括各个阶层：商人、医生、教师、经理、职员、学生、佣人、妓女、家庭主妇、迷信职业者和无业者等，他们组成了社会生态群体。十分可贵的是，作者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描绘和剖析，从横向联系方面，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具体生动的新加坡华族社会的风俗画，具有时代感。因此，莱恩·韦伯斯特在去年的一期《亚洲周刊》（英文版）中撰文指出：她是“把握新加坡时代脉搏”的最著名英语小说家。同时，我们还应指出，这幅把握时代脉搏的图画五彩缤纷的色调（或者说，每个短篇作品），绝非是各自孤立的个体，而是彼此组成一个网络，反映了整个社会形态，并且构成了纵向联系，具有历史感。它让人们从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范围和活动规律中，找到了他们的“根”。

华族社会生活中的“根”，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等，特别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影响，它深深地扎根在华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家庭生活中。这种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包括基督教在内，产生着尖锐的矛盾和对立。中篇小说《毒蛇的牙齿》就集中反映了这种矛盾与对立，它有力地表明，家庭中的孝道和整体利益，是世俗生活中的大事。作者有意引用莎士比亚作品《李尔王》故事中李尔王晚年对两个虐待他的不孝女儿进行诅咒的一大段精彩的言词，来表明儿女的不孝就如毒蛇的牙齿一样令人可怕和可憎，因此，家庭的孝道和整体利益不可逆。

作品《毒蛇的牙齿》中，安吉拉家庭正经历着孝道和整体

利益的危机。安吉拉的公公、婆婆虽然生下四个儿子，但只有大儿子阿邦和他妻子安吉拉，能尽孝道，能顾及家庭整体利益，其余的都不是好东西。三儿子卫南和他妻子，就知道向大哥借钱，对家庭发生的一切困难丝毫不负责任，二儿子卫强及其妻则会叫苦装穷，明明有漂亮宽敞的房屋不住，却要住在租来的狭窄的公寓房子里，为的是怕婆婆要跟他们到哪宽敞明亮的房屋去住。这种把老人当包袱，丢给安吉拉负责的作法，与儒家的孝道大相径庭。至于最小的儿子阿雄，就更不像样了，跑到澳大利亚去，跟一个澳大利亚寡妇的关系弄得不明不白，只知道写信回来要钱，一心埋在基督教的宗教狂热中，家庭的孝道和整体利益，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尽管父母最疼爱他，就象李尔王最疼爱他的两个女儿一样，但是，最后他却成为最令人失望和厌恶的宗教狂人。

毫无疑问，在新加坡——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和受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里，家庭的孝道和整体利益正面临着危机，或者说正濒临崩溃边缘。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竭力发展个人主义，突出个人价值和利害关系。特别是，由于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这种价值观常常是在发展个人主义和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就损害公众和别人的利益，达到不择手段，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地步，甚至发展到了极端，走上犯罪道路。人们从《毒蛇的牙齿》的具体描写中不难看到，阿邦的弟弟们，他们感兴趣的是向阿邦要钱和如何营造自己的安乐窝，对于父辈们遵崇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修身治家，重礼尚孝，早已丢之脑后。相反地，安吉拉则在千方百计维持大家庭的残局，真有点像在扮演《红楼梦》中凤姐的角色。尽管她在愤怒地大声叫喊：

“什么讨厌的事情都让我一个人承担，这太不公平了。”但是，她终于没让大家庭在一时之间崩溃，只是到了婆婆最后死去，她才感到松了口气，终于送走了瘟神，并为即将迁入豪华新居而感到心满意足。很显然，安吉拉是一个具有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意识的人，她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和文化影响较大，所以，她对丈夫和她独力支撑这个大家庭的经济生活，包括要拿钱接济丈夫的弟弟们非常不满，常为此发牢骚。但是，她毕竟也接受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在婆婆没离开人世之前，她不敢只顾自己，不顾大局，起码不敢把婆婆赶走，明知她给家庭和子女带来许多烦恼，这就是家庭的孝道和整体利益在起作用。但是一旦父辈一代在人世间消失了，她也就在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获得了解放。只要看她多么厌恶婆婆讲的鬼故事和迷信思想行为，以及对她小儿子迈克尔的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就会明白，她是从心里讨厌婆婆的。但是在表面上，她仍不敢有半点逆婆婆之意的表示。这正说明，家庭中的孝道和整体利益，在新加坡两代人中，正经历着危机，对于后一代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教育影响的人来说，它几乎不可避免地趋向崩溃的边缘。

凯瑟琳·林的艺术敏感性就在于此，她与人民生活保持密切联系，她真实和迅速地反映了华人家庭文化传统心理所经受的冲击。

当然，这种冲击还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老一辈的人想以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作为文化传统价值，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如《毒蛇的牙齿》中公公和婆婆随时随地都在影响家庭的其他成员，包括他们的孙子一代在内。但是，这种传统文化也遭到子孙两代人的抵制和批判，最小的儿子卫雄以基督

教教义抵制和批判了它；孙子一代如马克也抵制了它；首当其冲的安吉拉表面上容忍了它，但从心理上坚决抵制它，她把婆婆几乎当成了瘟神，在思想感情上与她格格不入。安吉拉是最讲究实际的一个人，只要能将家里的那只古床修饰一下，卖个好价钱，她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古床的四支柱上的龙蛇雕刻，具有什么文化价值，她才不管呢！如果不是别人提醒她古床与古董沾上边，她还会当作垃圾，连同婆婆家的一切迷信的杂物，一起扔掉或烧毁。由此可见，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在新加坡的华人家庭中，也在经历着危机，或者说在经历着变化。

在西方现代文化教育影响比较突出和严重的新加坡，中国的文化传统正经历着变化和冲击，甚至正面临危机，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毒蛇的牙齿》的精华所在，它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华人社会家庭文化传统心理所经历的变化和现状，从中窥见新加坡时代脉搏跳动的一斑，这是作品艺术描写成功之处。

凯瑟琳·林作品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探索新加坡社会的恋爱和婚姻问题。选集中所选的这类作品都选自《梦的影子》——新加坡爱情小说集，它们集中体现了爱情婚姻的悲剧效应。《变心》中的丈夫在功成名就之后，就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移情于他那年轻美貌的秘书，准备抛弃他那在经济上一直资助他上大学和出国深造的结发妻子——一个作包餐小买卖的普通妇女。其唯一理由是他妻子文化水平低，地位卑微，不配跟他一起在社会场合露面，只能给他带来灾难。当他的如意算盘正要实现的时候，现政府当局的一位部长告诫他，离婚在政界是一件丑闻，对他想步入政界是一大

障碍，劝他要慎重行事，不能跟妻子离婚。因此，他只好暂时放弃这一企图，叫他的秘书忍耐一下，等待时机。然而他的女秘书却不愿意，指出他“没有面对真理的勇气”，是把她当作“实现政治野心的障碍”，只作为一种工具使用，所以她不能爱他，她离开了他。这表明，女秘书艾琳在爱情婚姻抉择上的自尊心，她追求和向往的是独立自主的真诚相爱，而不是把爱情婚姻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

爱情的主题在作品《瓦尼莎·陈白莉》中，也有精彩的描写。女大学生瓦尼莎由于出身贫苦，不敢爱富贵之家的男大学生杰拉尔德。但是男方不因女方出身低微而嫌弃她，他们之间的结合该是指日可待的。不料女方突然发现自己的母亲原来并非一个工人，而是一个妓女时，痛苦万分，她觉得无脸面去同男方相会，母亲的丑事直接妨碍了她的爱情幸福。在这里，作者有力地揭示了“野心”和“自尊心”两种人生态度的冲突。如果瓦尼莎有着独立自主的自尊心，不存在金钱和名位的野心，不是为了高攀他，她又何必为出身低微和为母亲是妓女而痛苦至极呢？在这两篇作品中，作者明确地要让人们明白：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新加坡，恋爱和婚姻，在实际生活中已被金钱和名位关系所笼罩，人们在摆脱这种关系去追求真挚的爱情幸福是多么不容易。但是，揭露笼罩在这种关系上的丑恶，使人们培养和树立自尊心，特别是对妇女来说，是多么重要，也是刻不容缓。

作品《穆尼安迪》的故事，就集中描写了一位印度男人，为了恢复人的尊严而最后自杀的故事。看来，作者对普通人应具有自爱、自尊、自强的道德修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提倡。

凯瑟琳·林作品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描写在新加坡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人们在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对物质利益的欲望和追求特别强烈起来。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出现了过分看重个人的物质利益，人与人之间对物质利益的争夺非常激烈的现象。这是在新条件下所出现的一种新的观念，它是在新加坡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人民的经济生活相对安定和富裕的情况下产生的。对此，作者曾经指出：“事实上，新加坡人现在过分的注重个人成绩，好工作、房屋、结婚等（即典型新加坡人的目标：一个妻子两个儿子三个房子四个轮子），不是什么畸型的社会形态，许多国家都是这样的。”②例如，在《毒蛇的牙齿》中，安吉拉把祖先的古床占为己有，所卖的钱也自己独吞了，就是一例。她的丈夫也为争夺一名议员的席位而费尽心机，安吉拉也助他一臂之力，企图获得成功。然而，最后还是输给了一个叫赵宾霄的工程师。虽然如此，安吉拉本人仍不甘失败，她说：即使阿邦不能参加到政治中去，但马克（她的大儿子——笔者注）最后还是要参加的，因为他事实上已经选定名流学院了。除此，安吉拉从一开始，就在为她那漂亮豪华的住宅操心，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建成了新的府邸。安吉拉一家的生活，是新加坡中层家庭生活的缩影。目前，这个阶层在新加坡正迅速扩大起来。

应该指出，追逐金钱，争夺名位和物质利益，不仅发生在这类中层人物身上，也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这些人也在作着发财梦。贫苦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瓦尼莎·陈白莉正为着自己的地位卑微痛心疾首，她多么盼望有朝一日富裕起来。她的姨母也再三叮嘱她要以她的教育程度为依靠，找一个富家

子弟作配偶，要让她的丈夫福荫她的家庭。她本人在这种环境和社会风气的熏陶下，以贫为耻，以富为荣。为了迎合她的情侣的心理，不惜弄虚作假，借她姨母的漂亮住宅，穿上她姨母女儿的时装，同情侣相会，并宣扬这一切都是她家庭的，以显示她的身份和地位也非一般，至少可以和他相匹敌。在她看来：钱！钱！它给人们以信心，使人们受到尊敬。它也能给人们以爱情，有了它，人们才能有足够的饮食和医疗，才能开始考虑爱情。所以，“瓦尼莎幻想着花园里美丽的秋千和配有弹簧凳子的钢琴，使环境富有浪漫色彩”。尽管瓦尼莎最后向她的情侣承认她弄虚作假的不诚实处，表示改过，但是，当她意料之外发现她的母亲原来并非一家餐馆的女工，而是在一个黑暗狭窄的房间卖淫时，她感到无地自容，并责怪她的母亲怎么能这样做？这时，瓦尼莎完全陷入困惑之中。但是，她的母亲却是完全清醒的。她母亲说：“我必须在这里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给我足够的钱，我需要钱！”作者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新加坡社会笑贫不笑娼的现象，是促使瓦尼莎母亲卖淫的主要原因，不然，她哪来足够的钱供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和三个子女读书的费用呢？

瓦尼莎似乎还不明白母亲的苦衷，责斥她说：“你让我们丢脸！你让我们丢脸！”并双手大力地捶击母亲。母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大声叫喊：“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做吗？你以为我想跟那些刚从工地和地下道里钻出来的男人一起睡觉吗？你以为我喜欢他们喝醉后吐得我满身污秽吗？你以为我喜欢这些吗？”母亲的话，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叫喊。这种叫喊不知压抑了多少时日，今日终于可以一吐

为快了，起码也希望能博得女儿的谅解和同情。在这里，作者对以金钱为中心、以争夺物质利益为目的、笑贫不笑娼的丑恶社会现象进行猛烈的抨击，她所揭示出来的这种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把金钱和名利地位作为衡量人的存在价值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是腐蚀人们心灵的腐蚀剂，它除了使人变成唯利是图和导致人的道德堕落之外，不会给人带来好的结果。可悲的是，瓦尼莎在明白她的前途是靠着母亲卖淫的钱得以保障之后，还不能理解和原谅母亲的苦衷，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篇作品的主人公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它的结局无疑也是悲剧性的。我们甚至能够发现，在选集中的许多爱情故事，都不同程度的具有悲剧特色，而以悲剧结局的为数也不少。对此，应如何理解？据我们观察，作者无非是要说明在文明国度的新加坡，它还是个年轻的国家，它在经历着发展和演变，并不完善，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它还存在着不幸和弱小者正在经历着的悲剧事件，这些悲剧事件不能等闲视之，要引以为训和值得人们深省。这就是作者的用意。

本选集的个别作品描写了鬼魂的活动。这一方面是作为华人社会生活的传统习俗的背景而存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是相信灵魂复活和来世思想的。但另一方面，作者也认为，所谓鬼神存在，也是与人的胆小和受鬼神魔力强大的错误观念影响所产生的一种敬畏心理有关。在这类故事中，作者的用意是借有些人相信鬼魂的存在来批判迷信思想。为此，她在《他们回来了》一书的扉页上写道：“你相信鬼魂吗？”回答说：“我不，但是……”这个“但是”，我们

认为就是指生活中有些人相信，所以她要作为迷信加以揭露和批判。还应该指出，这类故事中出现的鬼魂，绝非是与人世间的的生活毫无关系的耸人听闻的鬼怪故事，而是包含着与死者有密切关系的生活故事，以及死者（亡灵）高尚人格或精神对活着的人产生影响的故事。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比《聊斋志异》中的鬼故事，似乎更生活化一些。

凯瑟琳·林的多数作品，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征。

首先，她的多数作品是从生活的事实出发。有的作品，几乎接近新闻报道，有很鲜明的现实性。同时，这些作品都有比较完整的情节和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展开故事情节时，也往往是有背景、有发展过程和有结局。其艺术结构形式，是属于中国式的讲究故事情节、故事性较强的格局。

其次，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多运用白描手法，用最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少作渲染，就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作者也非常注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着意发掘人物身上的善与美。对不幸和弱小的人们，寄予深切的同情。虽然她不作愤怒的呐喊，也没有鼓动性的怒吼，只对她所熟悉的人和事物，对她所关心的事件，用客观和几乎超然的态度来加以描述。然而，由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也即是选择事实和性格的真实性，所以人物和故事都充分地显示出它的艺术魅力。

最后，作者在艺术描写手法上，采用了多种描写手法，使作品的表现力多姿多彩而不至于单调。这些手法主要有：对比手法，使善与恶、美与丑对照鲜明；幽默讽刺手法，让

幽默的笑充溢着生活的角落，表现出对阴暗面的针砭。作者还常用意外结局的手法，把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中，使故事情节变化莫测，能引人入胜。这种意外结局的表现手法，常常对主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凯瑟琳·林的个别作品，则采用梦幻和荒诞的表现手法，使阳界和阴间、现实世界和梦幻境界互相交错，产生一种怪诞奇离的效应，但绝非是一种“空幻”。在作者笔下，梦境有时是虚境，有时则是真境，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并非虚境。这种有实有虚，虚实结合的描写手法，最早出现在中篇小说《毒蛇的牙齿》中，到短篇小说集《他们回来了》出版时，这种表现手法的份量增多了。但在一九八七年出版《梦的影子》时，该小说集中只有极个别作品运用这种表现手法，绝大多数作品还是运用现实主义方法的。

译者

一九八九年八月七日

注①② 林松辉：《在创作的道路上》

毒蛇的牙齿

序

安吉拉回忆着过去痛苦与悲惨的一切经历，声音颤抖地说，最后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在这里拣破烂和清理垃圾堆了。

正象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把这位老人送进了圣陆克山医院。在新加坡没有一间医院可以提供良好的照料（或者要很高的费用）。但是最后，她安静地死去了。她的骨灰根据她自己的意愿，存放在登路的寺庙里。

她那经常哭泣、有些傻气并构成一个累赘的养子，我送回给他的母亲。临到最后，她断言她没有办法照管他——一个三十岁的傻子。她渐次提到钱的事——我早就料到了——我们偿付了三千块钱。现在，依我看她把他送到了卢穆特^①，跟一个年老的亲戚住在一起。

我那可怜的小迈克尔，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从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你可以想象到，在一个老疯子和傻养子的影响下他所遭受的痛苦。福亚大夫正尽他的最大力量，我每天祈求上帝，望不久能一切平安。

在这个悲惨的日子里，我的马克与米歇尔是我的支柱。我再三感谢上帝，他们遭受的痛苦不会给他们带来过坏的影响。马克得到了优秀奖学金，米歇尔回到了她的训练班。她

^①位于马来西亚沙捞越。

的教练告诉我，在今年6月举行的东盟游泳比赛上她将获得第一名。

至于我的阿邦，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走得远远的，被别人，从部长到年轻女佣人，无耻地占着便宜。我祈求人们能承认他的真实价值。因为人们有时根本不看你的真正本质。

至于对这个在困难的时候希望能同舟共济的家庭，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全部，全部都溜了——当困难刚刚出现的时候。

那个卫强和他的妻子——一想到这两条毒蛇，我的心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股票和金条——祝他们走运。

至于卫南和他那孤僻的歇斯底里妻子——我祝他们在加拿大新居里能过得愉快。最近几天我正准备在阿邦的衣袋里寻找一封他一直不敢给我看的信，另一封要钱的信。请你留心听我的话：

只剩下我一个人拣破烂和清理垃圾堆。

人们都走了。

还有那个卫雄——我要感谢上帝，直到我死那天，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肯定立刻杀死了那个老人。他绝不会让她在老年时安静地死去——他，是她一切希望的宠物。

全部，全部都溜了，只留下我来重新安排一切事情。

你谈到我的平静，我的勇气，但是你不知道我的梦想。我再也不谈晚上的烦恼了。他们回来了，你晓得恶魔又回到了我的梦里，他们向我嚎叫。我怎么能忘记老头子棺材的敲击声以及老太婆对雷击闪电的咒骂声呢？

昨天晚上，我又作了一个梦，梦见了在彰宜的木头房子。